

六月四日是端午節。兩天前，清華四導師之一的王國維先生在北京投昆明湖自盡，永遠告別了端午節。他的去世使混亂的一九二七年更添一絲哀愁，也留下了至今沒弄清的懸案：他為什麼要自殺？末代皇帝溥儀認為，王國維的死與其親家羅振玉有關。羅振玉知道溥儀有批字畫要託王國維賣後，假意說由他來賣，賣後卻扣留了賣字畫的款項，說要算舊帳。這些錢還不夠王國維所欠他的銀兩，而官裡又催得緊，於是極好面子的王國維走投無路了。毛澤東曾有詩云，「莫笑昆明池水淺」，言外之意是，王國維在二尺深的水裡照樣淹死了。

毛澤東自己也沒能料到，這竟是他此生與全家人一起過的最後一個端午節：一家五口，加上兩個弟弟、兩個弟媳以及丈母娘和弟媳肚裡的孩子。

熱鬧中的都府堤四十一號主人們絲毫也沒想到，這是他們最後的歡樂。女人們在房內外懸上艾草菖蒲，給孩子們帶上香囊，還用雄黃酒在每個孩子額頭上畫一道，寓意為避邪。

面對兩個都是老共產黨員的弟弟，毛澤東表露了他心中愈來愈強烈的預感：革命可能會遭遇空前的低潮。國民黨的兩位

代表蔣介石和汪精衛，似乎在對待共產黨的問題上日趨一致。發生在上海的「四一二」和發生在長沙的「馬日事變」都是強烈信號。別看此刻寧漢還是分裂的，但從汪精衛的算盤中，已能察覺出他反共的端倪。

毛澤東當然不知道，汪精衛此番從蘇俄回國，一路上幾乎就是被俄國毛子當俘虜似地押著，這已引起自尊心超強的汪精衛強烈反感，他內心與蔣介石的內心幾乎一樣，目的就一個：做領袖，統一中國。

共產黨似乎也想趁亂奪權。但在毛澤東看來，這完全是想著美、做著難的事。且不說國民黨會不會拱手相讓，就是共產黨內部此刻也是亂紛紛、沒有頭緒。革命導師陳獨秀已不被黨內當權者看好，很可能被黨拋棄。這個不識時務的秀才，一年前堅決反對北伐，可北伐勝利了，他不肯把黨中央移到武漢，可還是灰溜溜來了。

五大以後，中央誰在主事呢？看上去好像有人主事，機關在不斷開會，似乎運作正常，瞿秋白還被增選為常委等，但實際上沒有了路線方針。鮑羅廷、羅易只會隨波逐流，如果硬要說有路線的話，那條所謂的「國民革命」的路線，隨著時局的變化也是必敗無疑。

「國民革命」的路線源自列寧的著名論斷：一個國家非經過國民革命，不能有社會革命。共產國際的國民革命路徑是：要求中國共產黨全力把有名無實的中國國民黨充實起來，擁護並幫助它奪取全國政權，然後在它的統治下，再由共產黨領導社會革命，推翻國民黨，取而代之。

毛澤東對毛澤民說：「潤蓮，你會算帳，這筆政治帳，是賠還是賺？」沒等回答，他接著說：

「我看是包賠不賺。一旦蔣某人、汪某人坐穩了江山，他們是不可能容得下我們這幫書生的。宋太祖說得好啊，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已經發生的一切都可以證明我的結論。」

毛澤民告訴毛澤東一件事，雖然在蔣介石集團控制下的地區共產黨活動不是轉入地下，就是遭遇了滅頂。可奇怪的是，鄭超麟翻譯的《共產主義ABC》卻賣得特別好，不知是為什麼。

毛澤東說：「我看過，通俗易懂，它回答了以前很多人都搞不清楚的廢除私有財產的問題，湖南農民運動的那些領頭人恐怕也都讀過呦。我的土地革命思想或多或少跟此有關，中央宣傳部就應該多做這樣的工作。只是，它賣兩角錢一本，我的書卻只能賣一角錢一本。潤蓮，是不是你定的價？」

毛澤民笑了：「你莫打我囉，不是我呀！但我知道這回事。洋人的書，總是要比我們自己的值錢。有人預測，這本書可能是這兩年全國銷量最大的書呢。」

毛澤東深深地抽了一口菸，沉思一下說：「中國人的傳統就是外來的和尚好念經呦，但從目前狀況看，鮑羅廷的經在汪某人那裡不靈了，那位羅易先生又自搞一套。我看，武漢的形勢愈來愈像南京了。」

毛澤覃說：「現在武漢的軍事力量都在指望與馮玉祥合作，唐生智是不會放棄湖南、湖北的，何健對共產黨也一直有成見。張發奎四月才剛剛接任第四軍軍長，雖說他現在還沒有反共徵兆，但他顯然害怕湘軍，想帶部隊通過江西的跳板返回廣東，那裡才是他認為安全的地方。」

毛澤東很高興這個自己一手帶大的小弟能有如此見解，笑笑說：「看來你在軍隊裡工作沒

有白幹，你的分析有道理。從湖北經湖南到廣東是捷徑，但湖南是唐生智的地盤，不會讓張發奎路過，他只有從朱培德的地盤江西過，朱培德打不過張發奎呀。由此，你們就可以發現，共產黨為什麼沒有國民黨自由，就是缺少槍桿子啊。現在有多少商店停業了，還有那些紙鈔票，老百姓都不敢再用。從種種跡象看，武漢已經到了千鈞一髮囉，和平日子不多了，我們三兄弟在一起的日子恐怕也不多了。」

在廚房忙活的女人們準備好了飯菜，楊開慧叫兄弟幾個吃飯。這頓豐盛的家宴，沒有減輕毛澤東對時局的憂慮。他吃著楊開慧剝好的粽子說：「上海、廣州、湖南的共產黨被殺頭的很多啊。潤菊，你們都有切身感受，我們全家都要有思想準備。我想啊，一旦情況有變，就要趕快轉移，潤蓮負責把家眷護送回湖南，潤菊跟著部隊。我估計，葉挺會去江西。」

毛澤民忙問：「大哥你呢？」

毛澤東看看大家，對楊開慧說：「我暫留武漢，觀察形勢，但我也會隨時轉移。」他又對毛澤民說：「三十六軍副軍長周爛去了長沙，我跟此人過有過交道，幫他解決過糧食問題。他在湖南，多少是條退路。」

在這個家庭裡，毛澤東有絕對的權威，與大家商量的事，通常是他已經決定了的事。只是他沒能掐算，就在第二天，共產國際代表羅易會將一份絕密電報給汪精衛看，而汪精衛依據這份電報，開始策劃與共產黨分道揚鑣。毛澤東更不知道，毛澤覃說的那個何健幾年後會挖他毛家祖

墳，並殺害他的妻子楊開慧。

國內的所有中國共產黨人沒有人知道，五月中旬史達林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痛斥了蔣介石，並談了武漢政府與土地革命的問題，這位正朝著組織方向行進的格魯吉亞人否認了托洛茨基對他的指責。

托洛茨基認為，史達林的中國政策是嚴重的階級妥協路線，正是這條路線導致中國國內的共產黨從高潮正在走向低潮。於是，史達林由於蘇俄黨內鬥爭的需要，向中國共產黨發出了著名的〈五月指示〉，即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一〇七號會議記錄。

這個指示五月三日就已電傳至共產國際代表羅易處。這位實際是托洛茨基代表的印度人看過指示後，悄悄打著自己的算盤，他想以一己之力來挽救中國革命。〈五月指示〉的中心內容，是要求中國共產黨採取更加激烈、更加徹底的革命，擴大工農武裝，進行土地革命。其中包含四條強硬要求：

一、堅決主張沒收地主土地，千方百計地加以促進土地革命，但只應沒收大、中地主的土地，不要沒收軍官與士兵的土地；

二、從下層多吸收新的工農領導人加入國民黨中央，他們大膽的意見會使老頭們變得堅決起來，或者使老頭們變成無用之人，改變國民黨目前的結構，務必要更新國民黨上層人事；

三、應消除對不可靠將領的依賴性，動員兩方共產黨員和兩湖地區五萬革命工農，組建可

靠的禁衛軍，以便解除不可靠軍隊的武裝，現在還不晚；

四、組織成立以著名國民黨人和非共產黨人為首的革命軍事法庭，懲辦與蔣介石保持聯繫，或唆使士兵迫害人民、迫害工農的反動軍官。

收到指示的鮑羅廷與陳獨秀一致認為，經過蔣介石的政變，以及夏斗寅、許克祥的軍事對抗，加上天旱和經濟狀況惡化，脫離農會的農民已成風潮。僅以湖南為例，原可控制的五十個縣，如今只剩下三個。按此刻中國的時局，〈五月指示〉顯然是不可能執行的。於是決定將這個指示暫時保密，並含糊地報告共產國際，中共中央將等待時機再執行這個指示。陳獨秀等知道，他們沒有任何力量可以提出反對意見，即使心裡反對，表面仍須贊成。

然而，羅易不這麼想。這位根本不了解中國文化和中國人的印度人只從自己的角度出發，想當然地認為，汪精衛作為孫中山的繼承人是可信的。而且共產黨的支持對當下的汪精衛來說仍然很重要，這種同盟關係對落實〈五月指示〉是好時機，如果說服汪精衛成功，中國的農民運動之火則可能重新點燃。

孤獨的羅易還有一個私心，他想讓鮑羅廷、陳獨秀等人明白，不要小看他的能力。他堅信，通過中國的農民運動，完全可以做到與國民黨的關係既不破裂，又能用武力討伐蔣介石、張作霖之流。

於是，羅易擅自將共產國際的〈五月指示〉送給汪精衛看，居然還傻乎乎地給了汪精衛一

個副本。一件嚴重違反黨的紀律、將導致已經非常脆弱的國共關係轟然分裂的事發生了。

〈五月指示〉讓自負且自卑的汪精衛產生了極大恐懼，想到四月初在上海聽吳稚暉關於共產黨要吞併國民黨的話。那時根本不相信那個吳瘋子，現在看來，並非空穴來風。生性多疑的他立刻開始本能地反擊，不動聲色地策劃了三件事來穩固自己的地位：

其一，先穩住共產國際。方法是矯枉過正地向蘇俄要錢，要一千五百萬的貸款。他知道，此刻共產黨最不願意喪失的是武漢這個獨立的地盤。上海、廣州、南京、北京等地，共產黨都不可能公開地進去。他們要有所作為，就必須有公開的地盤。可以料定，共產黨會努力維護與我汪兆銘的關係，蘇俄不可能給二千五百萬，但武漢政府可以漫天要價，以造成離不開蘇俄的假象。最終，他得到了兩百萬盧布，可對他來講，錢已非主要問題。

其二，充分利用鮑羅廷所謂的「西北學說」，以張發奎、唐生智之兵力，在河南與馮玉祥會師，並極力拉攏馮玉祥這位善變的將軍。這一招如果能成，將改變中國當下的軍事與政治格局。那時，把唐張的軍隊撤回，以保衛兩湖。

汪精衛用了近一個月的時間，實現了他的目標。雖然不全面，但也營造了他最終決定分共的大環境。

其三，利用張作霖在北京蘇俄大使館抄到的大量秘密文件，來說明蘇俄對中國幕後作用的險惡用心，並藉此解除鮑羅廷等人的民國政府顧問職務。這批文件中還公開暴露了蘇俄大力援助

馮玉祥的事，馮玉祥肯定會極力撇清，對汪精衛來說，這也是聯手西北軍的契機。這批文件將產生一箭雙鵰的作用。

解除鮑羅廷等一百四十名政府顧問的決定在六月五日就已經做出了，只是到了月中，才由鮑羅廷的好朋友、外交部長陳友仁向鮑羅廷等宣布。而那時，汪精衛已與馮玉祥達成協議，武漢北伐的部隊將從前線撤回湖北。

羅易更不了解的是周恩來的本事。剛到武漢不久，對特務工作很有心得的周恩來在國民黨的軍政兩界都有很多朋友。羅易剛洩密，他就得知了消息。陳獨秀、鮑羅廷等得到周恩來報告後，非常震驚，立刻要求共產國際召回羅易，並採取積極的補救措施，包括共產國際總書記布哈林以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名義直接致電汪精衛，解釋〈五月指示〉，以減少汪精衛的恐懼心理，但一切都無濟於事。

洩密事件看似偶然，實際隱含著必然，它點燃了「大革命」徹底失敗的導火線。

當羅易意識到問題嚴重性後，乾脆硬著頭皮往前闖。一邊不斷給莫斯科去電報，說鮑羅廷是洩密事件的既得利益者，他在破壞我羅易的名譽，撈取巨大的政治資本，共產國際應該迅速將陳獨秀等清除出共產黨的領導機構。另一邊，羅易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堅決主張執行〈五月指示〉，同時又去汪精衛那裡訴苦，指出他為這事陷入了尷尬的處境。

但羅易的一切努力都失敗了，共產國際相信了鮑羅廷的話：汪精衛沒有充當雅各賓革命黨



人，而是因此叛變了。經過六月下旬的一次秘密會議後，共產國際決定召回羅易，命令他務必在六月底之前離開中國，返回莫斯科。為此，共產國際執委會還成立了「羅易事件調查委員會」。這個委員會在八月三十日對羅易做出了結論：「羅易同志被召回，只是因為他犯了一個組織性的錯誤。」「在關於土地革命和鎮壓湖南反革命分子的基本問題上，羅易同志的方針是完全正確的。」

沒有處在權力中心的毛澤東對這一切並不知曉，他還在努力安撫從湖南來武漢的同志，要大家做好繼續鬥爭的準備。

毫無疑問，〈五月指示〉跟毛澤東當下的想法是吻合的。創建一支可靠的軍隊，在毛澤東看來是永遠也不會過時的理想，這是他通過自己親身經歷所得出的結果。雖然這時他思想深處，還沒有把「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理論基礎完整化，但他看到了蔣介石的成功、北伐中各軍的擴張，以及共產黨在武漢受制的根本原因是沒有槍桿子，原本零碎的掌握槍桿思想在腦海中愈來愈明晰。他清醒地認識到，從古至今，亂世中書生造反要獲得成功的可能性幾乎沒有，所以他十分支持小弟弟毛澤覃從軍。

中共五大以後，毛澤東愈發認識到鮑羅廷等人在政治上的幼稚。唐生智、張發奎繼續北伐，實際是執行了鮑羅廷「西北學說」的路線。鮑羅廷堅定地認為，上海等地不適宜作為革命的基地，那裡的帝國主義勢力太強大。而所謂「西北學說」，就是想利用國民黨的北伐，到西北去建立革

命的基地，那個地方離蘇俄近。

「西北學說」的具體步驟是：往河南打，把一直受到蘇俄支持的馮玉祥從陝西接到河南。會師鄭州後，背靠西北，打通與蘇俄的國際交通線，然後再謀劃東征蔣介石，繼而打敗張作霖。

鮑羅廷之所以敢如此布局，是因為他掌握著唐、張二人打仗所需的經費。而汪精衛從國外初回，要想抗衡蔣介石，就必須做出讓國人認可的事蹟，比如北伐。因此，武漢二次北伐，國共雙方一拍即合。

羅易是反對「西北學說」的，他在五大上指出：中國的中部及南部才是應該鞏固的革命基地，「西北學說」實際上是拋棄或削弱現時革命根據地的學說，是逃避土地革命的學說。他還一針見血地指出：原定以北京為目標的北伐已經不存在。

毛澤東心裡是支持羅易觀點的，在他看來，蔣介石去年發動「中山艦事件」時，就應該用軍事力量制止他，但鮑羅廷等妥協了。今年「四一二政變」就應該發動東征，用軍事力量與蔣介石硬碰硬，可中共中央依舊妥協了。毛澤東惋惜，「四一二」之前的長江流域革命形勢對共產黨多麼有利啊。

當六月五日，江西的朱培德禮送方志敏等二十位共產黨員出境的消息傳來後，毛澤東愈發擔憂起來。

近兩個月來，夾在寧漢之間的江西省主席朱培德在一番動搖後，開始行動。五月二十九日，他已遣送了以第三軍政治部主任、共產黨員朱克靖為首的一百四十二名政工幹部回武漢。現在又

禮送方志敏等人，而且取消了江西所有工農運動，這是要反的前奏啊。毛澤東想起在去年「中山艦事件」中，當時羽毛未豐的蔣介石唯一的同盟就是朱培德。

六月八日，漢口《民國日報》載：「許逆叛變後，在湘潭、株洲一帶進行屠殺，計死者五百餘人之多。」中共中央在醞釀重建湖南省委。毛澤東不知道，老朋友蔡和森已推薦他去湖南主持工作。中央為此做了決定，可並未公布，更沒有實行。

在六月的下旬，毛澤東還是以中華全國農協臨時執委會常務委員的身分開展工作。除了繼續向各省農協發出訓令外，還在抓緊做農講所學員畢業的工作。這批學員大多都將被委任為各地農協的特派員，畢業典禮定在六月十八日。對各省農協發訓令是從上個月開始的，繼續發訓令的目的有三：不斷揭露各地農協被打擊的情況；公布新時期政策；向武漢的民國政府提出有關請求。

在六月七日發出的第二號訓令中，列出了五項工作，要求各級農協切實遵照辦理：

一、注意強固組織，嚴肅紀律。各級農協都要自即日起做兩件事，一是執行革命紀律，清除土豪劣紳等不良分子；二是召集代表大會，增添新鮮血液。

二、注意革命同盟者的利益，與小商人等建立親切的革命聯盟。使有餘的米穀盡量流通，使小地主及富農不致感受不便。要切實保護革命軍人之家屬及財產。

三、打破封建惡習是必要的行為，但必須經過長期的宣傳，不可操之過急，否則反使反動分子所利用。

四、要盡快建立起鄉村的自治機關，已呈請國民政府早日頒布《鄉村自治條例》。農民銀行、

生產合作社、消費合作社都要建起來，消滅鄉村無政府狀態。

五、加強宣傳工作，扭轉過去對宣傳工作非常懈怠的局面。要切實將貧苦農民受土豪劣紳壓迫摧殘之事實，盡量發表出來。

訓令指出，倘有陽奉陰違或執行不力者，必繩以革命紀律，立予改組。其有反動派藉名滋事或捏辭誣害者，亦須立予撲滅，毋使滋蔓。

六月十三日，第三號訓令又發出了。這個兩千餘字的訓令，用了大量篇幅揭露湘鄂贛農協及農協會員遭到報復性打擊的事實。訓令中指出，各地被殺的農協領導會員達兩千六百餘人。

訓令一針見血地揭露：各地土豪劣紳一方面勾結土匪潰軍殺害農民，另一方面還指鹿為馬地遙控農民，離間軍民感情。

訓令要求各級農民協會一致請求國民政府做四件事：

一、明令保護農工農組織及工人糾察隊和農民自衛軍。嚴懲一切屠殺農工的反動派。團結革命勢力，討伐蔣介石。

二、肅清湖北各縣勾結逆軍土匪屠殺農民工人的土豪劣紳，嚴懲造謠離間的蔣介石奸細。

三、明令嚴懲許克祥等人，解散「馬日事變」後成立的反動機關，恢復湖南省政府、省黨部、省工會、省農協等革命團體。並令湖南省政府唐主席從速鎮壓湖南之反革命派。

四、明令制止江西驅逐共產黨及工農領袖的行動。

兩個訓令均由中華全國農民協會臨時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譚延闓、譚平山、鄧演達、毛澤東、陸沉聯合簽發，由漢口《民國日報》發表。

今天，人們無法知道訓令的執筆者是谁。但從文章的思想及語言風格看，至少經過了毛澤東的修改。而毛澤東當時的心態是十分矛盾的，他無法預測革命的走勢，更無法弄明白眼前的一切都怎麼了？國共合作、北伐革命、農民運動似乎都偏離了方向，尤其是共產黨內部思想不統一了，行動不一致了，該怎麼辦？在黨內人微言輕的他在焦急中觀望。

六月十三日上午，毛澤東穿著灰布大褂，過江去參加國民黨中央軍事委員會會議，這是因為他對湖南「馬日事變」的調查與眾不同。他沒想到，汪精衛已經啟動了分共的倒數計時。

在這次會上，毛澤東實事求是地指出，湖南農民運動之所以出現部分偏差，引起湘籍官兵的反感，是因為農協中有哥老會的把持。這些人並不管什麼國民黨、共產黨，只管自己，做些殺人放火的勾當。正是他們戕害了軍屬。

毛澤東的調查是紮實的，這也是他日後走向共產黨領袖崗位的重要法寶。此次調查對象主要是從湖南逃到武漢的數十個農協領導，情況與他年初對湖南農民運動的調查有出入。那次更多的是針對應把革命火焰燒起來的調查，而這次則有了解決問題的理性。

武漢方面始終不能決斷是否用武力解決許克祥。但毛澤東強調，「馬日事變」確實是軍隊首先向農協進攻。他同時表示，如果能不用武力解決是最好的，因為當前所做的一切，都不應給

南京政府鑽縫隙的機會，所以他支持由唐生智親自去湖南走一趟，以期和平解決這次事變。

毛澤東沒有察覺出汪精衛請他評價這個事件的真實意圖，結果他的發言被有所準備的汪精衛利用了。

兩湖地區的和平是當前汪精衛鞏固自己地位的基礎。他在得知〈五月指示〉後，立刻起赴鄭州，商量拉回從武漢出發北伐的張發奎第四方面軍，以及唐生智投入的兵力，對付蔣介石可能的趁虛而入和即將開始的分共可能產生的後果。

拉回軍隊的前提是必須與趁亂打下鄭州、控制豫北、虎踞中原的西北軍總頭目馮玉祥達成協議。

六月十日，汪精衛看到〈五月指示〉後的第五天，便率孫科、譚延闓、唐生智等在鄭州與馮玉祥談判。汪精衛的如意算盤是拉攏馮玉祥反共反蔣，為此，武漢政府給了馮玉祥許多好處，如：公開給他地盤，封他一串官銜，同時劃撥軍餉，唐生智、張發奎的部隊撤出河南回武漢整頓等。

汪精衛曾對人說：「我真不大敢相信馮玉祥會支持我們。恐怕在他看來，我們武漢已經是個朝不保夕的窮親戚了。」

汪精衛帶著百分之五十的成果從鄭州返回武漢。急於撇清自己與蘇俄有關係的馮玉祥同意分共，但不同意反蔣。對馮玉祥的心思，汪精衛等人也是清楚的，馮不反蔣的根本原因是，武漢

沒有實力抗衡南京。在寧漢對峙不明朗的前提下，善變的馮玉祥是不會放棄任何機會的。但不管怎樣，馮司令同意分共，這至少解決了〈五月指示〉帶來的眼前之憂。兩湖不能亂，不能亂的基礎是要有可靠的軍隊，汪精衛在等待他的北伐部隊返回湖北。

鄭州會議表面看是公開會議，各軍中共方面的政治部主任亦有隨往，但這些有共產黨背景的政治部主任均被排除在會議之外。會後陳獨秀問會議情況，他們茫然無知，陳獨秀憤然說：「我們的耳目都被堵塞了。」

但毛澤東卻在《嚮導》週刊上看到陳獨秀這樣說：「國民政府的領袖在鄭州會議，已決定了討蔣政策。這是中國革命進展之一個重大時機，在革命史上值得大書特書。」毛澤東據此以為，汪精衛至少不會過早生出反共狀況。

在六月十三日，國民黨中央軍事委員會會議召開後幾個小時，國民黨第二十八次中央政治委員會會議就召開了。汪精衛把毛澤東在當天上午講的關於對湖南農民協會的調查，在會上講了一遍，指出湖南農民協會有不少被哥老會把持。他們既不知道國民黨是什麼，也不知道共產黨是什麼，只曉得做殺人放火的勾當，所以軍隊怒不可遏。汪精衛還說：毛澤東也承認，不用武力的辦法是對的。最後決定對「馬日事變」不用武力解決，只由唐生智去湖南走一趟。

得知汪精衛的談話內容後，毛澤東有苦難言，他知被人利用了。他心底的看法是，武力解決許克祥應該是此時最佳的辦法，可以一舉將共產黨的頹勢變為強勢，但目前共產黨根本無力做到這一點，只能將維護汪精衛的權威作為全黨首位工作。當下只有寧漢平衡，共產黨才安全。

為此，國民黨這邊以全國農協的名義不斷向各地農協發訓令；中共中央那邊也連續向各省委員會及各農協黨團，發出以「農字號」為話題的通告。雖然都對「馬日事變」表示了譴責，並提出懲辦要求，但中央通告的實質是抑制農民運動，認為農民是無組織的行動，要予以糾正。這一切在毛澤東看來，不過是再次給汪精衛擺出合作的姿態。

毛澤東一邊觀望思考，一邊應付各種會議。雖不知最高機密，但他還是敏感地發現，政治形勢似乎在發生大的變化。老毛子的聲音小了，那位張牙舞爪的羅易好像也癟了，黨內究竟發生了什麼？看來指望拉攏馮玉祥，僅僅是鮑大鬍子的一廂情願，也許是個政治笑話。

讓毛澤東沒想到的還有，日後將與他一起打下共和國江山的文官武將們僅上半年，也都已在風雨飄搖的武漢進進出出。他們中有成為他的主要助手、後又被他打倒的劉少奇；成為中共中央第二代領導核心的鄧小平，當時他叫鄧希賢，是個二十三歲的小伙子，被馮玉祥遣散不久。這些人彼此誰都不知道會在今後的近二十二年時間中分分合合，最終共同推翻了蔣介石。

未來共和國的將帥們在武漢聚首，有相當的人跟周恩來的到來有關。

周恩來比毛澤東小五歲，也是一九二一年入黨的他，此時在黨內的聲望遠高於毛澤東。

無法確切知道毛澤東是何時認識周恩來的。兩人在時間上的第一次交叉，應該是一九二六年一月在廣州舉行的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那次大會到會代表兩百五十六人，共產黨占了



五分之一。毛澤東被汪精衛看重，出任國民黨宣傳部代理部長，而周恩來被蔣介石看重，出任國民黨東征軍總政治部主任。很可能他與毛澤東在會上會下發生過交流。兩個人還曾在一個人身上交叉過，那人就是張申府。

中共創始人之一的張申府與陳獨秀、李大釗是好朋友，張國燾、周恩來、朱德都是經他介紹入黨。他為黃埔軍校推薦了十五名人才，第一個就是在法國擔任過國民黨巴黎通訊處籌備員的周恩來。而張申府在北大圖書館工作時，正是毛澤東的分管領導，顯然他那時不看好毛澤東這個師範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毛澤東還跟人說：張申府的老闆面色很難看……

國民黨二大閉幕後的兩個月便發生了著名的「中山艦事件」，蔣介石運用手中的軍權挑戰全體國民黨員以及蘇俄顧問們。據說，毛澤東與周恩來在如何處理這件事的問題上，意見近乎一致，都認為可通過其他軍事力量，將實力並不強悍的蔣介石逼下台。可惜老頭子沒有採納他倆的意見。

還有文獻稱，周恩來在毛澤東主持的第二屆廣州農講所講過課。

兩人在廣州分手，後雖在蘇區見過面，但直到九年後，才在貴州遵義會議上再次合作。從此，他們的合作取長補短地持續了四十一年，打下了江山，建立新中國，同時又建設新中國。

在一九二七年的六月間，周恩來已是黨內的軍事專家了，他幾乎是獨立成功操作了上海工人第三次起義。五月份秘密到武漢後，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由他代理張國燾出任中央常委，進入核心，並成為中央軍委的實際領導人。周恩來的留學、黃埔軍校、上海起義、中央常委等背景，

使得他身邊很快聚攏了一批軍人。

先說共和國元帥中排位第一與第四、第六的朱德、劉伯承、陳毅。此三人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參與領導在四川舉行的滬順起義，這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武裝起義。早在護國戰爭結束，任護國軍團長的朱德就在滬州駐過防。但原本挺好的起義形勢，因軍閥之間爭鬥，加之蔣介石不支持，堅持了幾個月後以失敗告終。一九二七年五月十六日，起義的最高軍事長官劉伯承潛出瀘州，繞道陝西，輾轉來到武漢。

而此前，朱德已離開四川，與在雲南陸軍講武堂的同班同學朱培德聯絡上，並在朱培德的北伐第三軍中建立了軍官教導團，任團長。當朱培德出任江西省主席時，任命了小他兩歲的朱德為南昌市公安局長。

朱德與周恩來的相識是在五年前（一九二二年）的德國柏林。那年十月下旬的一天，正在德國留學的朱德與一同赴歐的四川老鄉孫炳文，找到了住在柏林近郊瓦爾姆村的周恩來，當時周恩來是中共旅歐支部負責人。

不知朱德是否跟周恩來講述了他在上海被中共領袖陳獨秀拒絕入黨的遭遇，反正鐵了心要搞共產主義的朱德打動了小他十二歲的周恩來。不到一個月，經周恩來、張申府介紹，朱德、孫炳文成為了中共黨員。日後周恩來認了孫炳文的女兒、傑出的話劇導演孫維世為乾女兒。

陳毅是四月才離開四川到達武漢的。他既無介紹信，又無介紹人，根本無法觸摸到武漢的

黨組織。幸好在街上遇到一個留法時的同學，也是他的入黨介紹人顏昌頤，此人正在中共中央軍委工作。於是陳毅被安排進了黃埔軍校武漢分校政治部做准尉文書，同時秘密擔任校黨團書記。

周恩來要在武漢總結滬順起義的得失，於是，朱德、劉伯承、陳毅這三位四川老鄉，又在武漢見面。

共和國元帥中排在第九位的聶榮臻是周恩來在上海時的助手，他在武漢的職務是中共中央軍委參謀長，與周恩來是老上下級關係，而這種關係早在他們旅歐期間就已形成。

排在元帥第十位的葉劍英，時任國民革命軍第四軍參謀長，他是在「四一二」後，放棄了蔣介石的器重奔赴武漢的。周恩來正準備發展他為中共黨員。

在元帥中排第三位的林彪、第七位的羅榮桓和第八位的徐向前，在武漢的職位都很低。

黃埔四期的林彪從葉劍英所在的第四軍獨立團見習排長升任連長，獨立團也改編成第四軍第二十五師七十三團。二十一歲的他在武漢期間，還抽空回老家湖北黃岡，與一汪姓女子訂了婚。他不認識毛澤東，但這並沒有妨礙他日後成為毛澤東最大的盟友與最大的敵人。

二十五歲的羅榮桓是武漢中山大學理學院學生，幾個月後他將成為秋收起義中毛澤東的堅定支持者。過了二十八年，在共和國授勳的十大元帥中，他是唯一一個參加過秋收起義的元帥。羅榮桓是四月才離開湖南衡東的家，卻再也回不去了。當時他已結婚八年，有個半歲的女兒，妻子顏月娥終生沒改嫁，在他家住了六十五年。解放後，羅榮桓每月給家裡寄生活費。

徐向前是黃埔一期學生，也是共和國元帥中唯一的北方人，這年三月剛入黨。時任黃埔軍

校武漢分校政治大隊少校隊長，與年齡相同的陳毅成為同事，但軍銜比陳毅高很多。他後來主持的戰役，成了他的校長——蔣介石都要研究的案例，但他率領的中共西路軍也遭受過整個紅軍史上最大的失敗。

在元帥中排第二位的彭德懷，時任唐生智的湘軍獨立一師一團一營營長。一九二六年九月隨部隊攻進武昌後，於一九二七年一月率隊開回湘西北。並不是中共黨員的彭德懷，在岳陽暗中通知前往長沙調查「馬日事變」的鮑羅廷等人，說許克祥已有密電要求就地槍決他們。得到凶訊的鮑羅廷立刻撤回了武漢。

排在元帥第五位的賀龍是當時最具實力的一位，他的北伐軍獨立第十五師被擴編成第二十二軍，他也從師長變為軍長，手中握有一萬多人的隊伍，其中三千多人是他湖南桑植的老鄉。他設立在漢口的軍部，車水馬龍。他的部隊是汪精衛、蔣介石、張發奎等方面都想拉攏的對象，可他卻更願意與看上去非常儒雅且有軍事才能的周恩來打交道。

毛澤東後來曾對這十位共和國元帥分別有過點評：

朱德：度量大如海，意志堅如銅；

彭德懷：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

林彪：這個娃娃堪當大任；

劉伯承：一條龍下凡；

賀龍：紅二方面軍的旗幟；

陳毅：他是個好同志；

羅榮桓：君今不幸離人世，國有疑難可問誰；

徐向前：留得青山在，不愁沒柴燒；

聶榮臻：前有魯智深，今有聶榮臻；

葉劍英：呂端大事不糊塗。

自上海第三次工人起義獲得短暫成功後，周恩來一刻也沒放棄再次暴動的念頭。他明白，在如此微妙的時刻，手中掌握軍事幹部和部隊將是抗衡武漢政府的最佳選擇。雖然在黨內他對陳獨秀依舊是唯唯諾諾，但他超強的組織能力與判斷能力已讓人見識了厲害，正是他首先得到了羅易洩密的情報。

此時的毛澤東與以後將成為他麾下元帥的軍事將領們擦肩而過，但他對軍事鬥爭的認識一點也不比武將們弱，並且這種認識在他心中已漸成系統。同意並安排三弟去部隊工作非一時興起，而是一次有遠見的政治規劃。

而將要與他合作近半個世紀的朱德，現在的太太是湖南耒陽縣人，叫伍若蘭。朱德乃「東方普魯士」的女婿。這種冥冥之中的機緣，將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中國大地上，以「朱毛」或「毛朱」的形式出現，並席捲蔣家，改朝換代。

此刻的中國共產黨尚陷在蘇俄的管理窠臼中，似乎還找不到不與汪精衛政府合作的第二條路，善於從報端上發現蛛絲馬跡的毛澤東強烈感覺到了這一點。

在北京，北京政府內閣總理顧維鈞辭職，軍政府成立，奉系張作霖就任北洋軍政府陸海軍大元帥，代表著中華民國行使統治權。在世界眼裡，北京是正宗的中國政府，但張作霖等人是共產黨的死對頭，也是北伐的目標。

在南京，蔣介石的軍隊打著北伐的旗號，分兵三路，已拿下徐州。他已然成為武漢國民政府與中國共產黨的共同敵人。

在鄭州，兵家必爭之地的中原被馮玉祥趁亂拿下。據說他僅以傷亡四百人的代價，便牢牢控制了京漢線。而武漢國民政府的北伐軍卻在河南傷亡達百分之二十，正是武漢軍的奮勇激戰，才使得張學良率領的奉軍放棄了黃河以南而北撤。馮玉祥乘隙而入，再次把自己變成各方都想爭取的軍人集團。

鮑羅廷一直認為，靠蘇俄的盧布以及大量武器扶持才得以出山的馮玉祥以及他的西北軍是可靠的盟友（最早的一批援助武器包括步槍三萬一千五百支，子彈五千一百萬發，機關槍兩百七十二挺，大炮六十架，炮彈五萬八千發。借款總額達一千零九十萬盧布）。卻不知前不久還在悼念李大釗的馮玉祥，現在已急於撇清與蘇俄的關係了。

基於複雜的國內國際關係，馮玉祥不想讓世人認為西北軍是蘇俄在中國培植的軍隊。他要利

用手中的軍隊，游刃於南京與武漢政府之間。汪精衛不是怕蔣介石對武漢動武嗎？好哇，跟西北軍談啊。結果他不僅從政治上合法地取得了豫、陝、甘的軍政大權，武漢政府每月還要撥付九十萬元的軍餉給他，而汪精衛得到的是從北伐前線拉回部隊對抗蔣介石及準備分共。有趣的是，蔣介石在稍後與馮玉祥的談判，竟也握手言歡，西北軍從南京方面獲得每月兩百萬大洋的軍餉。

在如此的政治軍事狀態下，缺乏軍事實力的中國共產黨要想在尚有些政治基礎的兩湖生存，唯一可以合作的人只剩下汪精衛。在毛澤東看來，這種合作更像是依賴。

徬徨之中的毛澤東並沒有消極，他在等待機會，等待回他的家鄉「東方普魯士」鬧革命的機會。而讓毛澤東保持積極心態的是來自老家的各種信息。

這一天，他與多年前在江西安源合作搞工人運動的李隆郅（李立三）一起，召集從湖南來武漢請願懲辦許克祥的共產黨員和骨幹積極分子開會。

毛澤東與李隆郅是老相識。二十多歲時毛澤東在長沙貼出〈二十八畫生徵友啟事〉後，李經羅章龍介紹去應徵，第一次見到毛澤東。但毛澤東一直稱這位湖南老鄉是自己的「半個朋友」。

一九二二年秋，參加完中共一大的毛澤東受組織指派第一次去了安源，他自稱是「和尚打傘，無髮（法）無天」的年輕共產黨人。從長沙乘運煤列車到安源後發現，這裡到處是鄉音，安源的工人很多來自三湘大地。毛澤東很是興奮，覺得在這裡開展共產主義運動很有搞頭。

隨後，他以中共湘區區委書記名義派剛被法國遣送回國的新黨員李隆郅去安源。再後來，

又將劉少奇、蔣雲先和他弟弟毛澤民送到安源。從此，安源有了中共支部，有了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並於一九二二年九月十四日發動了震驚中外的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提出了一個響亮的口號：「從前是牛馬，現在要做人！」

毛澤民的理財才能也是在安源得到天才發揮。他任安源路礦工人消費合作社總經理，運作發行了股票，合作社很快成了黨活動經費的主要儲備點之一。據劉少奇等寫的《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略史》中稱：「這一次大罷工，共計罷工五日，秩序極好，組織極嚴；工友很能服從命令。俱樂部共計費用一百二十餘元，未傷一人，未敗一事……」而當時俱樂部所掌握的股本金已達一萬八千餘元。

然而，像安源這麼好的工運基地在全國太少了，似乎僅此一家。毛澤東深知，在安源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還是參加組織的工友絕大多數是湖南人，且大多是李隆郅的醴陵老鄉，這種勝利有太多的偶然性。毛澤東堅持認為，中國共產黨人要取得勝利必須從農村開始，只有農民的暴動才是可行、必然的。

當下，毛澤東有把握搞暴動的地方就只有湖南了。那裡是他的家鄉，充滿鄉音的情境可以讓他善於鼓動的演講才能發揮到極致。無論如何，湖南陣地不能丟失，在這一點上，李隆郅與他有同感。

會議開得很順利。毛澤東似乎從同志們的注視中看到些許希望，這種希望是來武漢的兩百



多人都還沒有完全失望或喪失意志，如果能及時往正在瀕臨熄滅的熊熊大火中加油添柴，湖南的農民運動還可能再次爆發。

他極力鼓勵大家要回去發動群眾恢復工作，山區的人上山，濱湖的人上船。毛澤東告訴大家，農民的問題只有從下至上才可能找到解決的辦法，而組織農民武裝暴動是現階段唯一出路。

實際上負責中央軍委工作的周恩來已制定出一個詳細軍事計畫，讓這批在武漢的湖南同志回去，深入各地，以暴動來抵抗許克祥，還準備派遣軍事人員潛入湖南。可這個計畫沒有得到老毛子的批准，始終不撥款。而陳獨秀的思想仍然明確：整個國民革命軍對湖南農民的過火行為都抱有敵意，夏斗寅、許克祥就是這種普遍敵意的代言人。

在毛澤東的內心，十分不贊同共產黨中央對「馬日事變」各打五十大棍的做法，他根本就不認為湖南的農民運動是魯莽行為，反倒認為那是農民的意志。這時，他從報紙上看到軍方在頻繁變動：馮玉祥被任命為北伐軍第二集團軍總指揮，唐生智為第四集團軍總司令，張發奎則是第二方面軍首腦；蔣介石已從南京去徐州，目的是與馮玉祥見面；張作霖六月十六日通電討赤到底，揚言：凡以此為目標者均為同志。

毛澤東在視察、權衡、等待。按張作霖的說法，蔣介石打擊共產黨，應該是北京政府的同志了。馮玉祥什麼時候會成為他們的同志呢？汪精衛又會在什麼時候成為北京的同志呢？原本在夾縫中生存的中國共產黨該怎麼辦？毛澤東焦急地等待屬於他的機會。

人們無法知道，毛澤東為什麼沒有參加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在六月十八日舉行的畢業典禮。講習所對毛澤東來說不只是一塊革命陣地，而且是他為之付出心血的巢穴。一九二六年在廣州，他主持廣州第六屆農講所成績斐然。他自己也因此成了黨內外著名的農民問題專家，他的學員遍布在各地，成為了革命火種。那次辦農講所還有意外收穫：小弟弟毛澤覃與湘妹子周文楠結婚了。

倡導在武漢辦農講所，原本只是搞湘鄂贛農講所，後因有鄧演達等的支持才擴大到全國。面對來自全國十八個省約八百人的農講所，毛澤東充滿了感情。可為什麼他沒參加畢業典禮？典禮的舉行地紅巷十三號，距離他居住的都府堤四十一號僅二百多米。只有一個可能，那天他不在都府堤。

六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召開第二十五次會議。這次會議涉及毛澤東的是要他根據中央政治決議起草一個湖南問題的決議。這樣的會議，毛澤東尚無資格參加，但可能因為有他的任務，列席了會議。還有一個可能，他在為一週後潛赴湖南做準備。

當然，沒有參加畢業典禮還可能是毛澤東與鄧演達等人的關係出現了問題，這個問題不太可能出在思想觀點上，而是出在政治大局上。因為在六月十九日開幕的湖北省農協擴大會議上，同樣不見毛澤東消瘦的身影，而鄧演達、唐生智、共產黨人譚平山、陳潭秋等出席了會議。

鄧演達是六月十四日從河南前線返回武漢的，這時距離他心灰意冷地告別中國國民黨還有十六天。六月三十日，滿腔熱血的鄧演達發表了著名的〈告別中國國民黨的同志們〉，然後秘密

化裝成檢查電線的鐵路工人離開武漢，潛往蘇俄。

鄧演達參加了汪精衛、馮玉祥的「鄭州會議」。對馮玉祥不費吹灰之力，僅以幾乎可忽略不計的傷亡拿下鄭州，又拿下整個河南，他十分不解。武漢國民政府的二次北伐，鄧演達做了大量工作，而且一直深入前線，他清楚北伐軍為此付出了什麼樣的代價。可現在馮玉祥在寧漢兩邊都派了代表，竟成了寧漢之間的調停人。在鄧演達看來，蔣介石是破壞農民運動的，南京政府的綱領不是三民主義，而是一民主義。而要完成三民主義，就必須解決農民問題。

按計畫，武漢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於六月十八日舉行了畢業典禮。每位學員都獲得了一枚銅質畢業證章，五角星中是兩個標準的同心圓，有黨徽和犁耙的圖案，還有「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中國國民黨」的字樣。

鄧演達出席典禮並主持，他在典禮上做了題為〈農民運動的理論和實際〉的演講，依舊用他善於鼓動人們聲音說道：「目前的農民運動，常常有人指為痞子運動。但痞子是什麼痞子，是怎樣形成的？他們是受了帝國主義軍閥、土豪劣紳的層層剝削，才墮落而成失業農民，才墮落而成農民無產階級……現在農村確有不少錯誤，這個就是缺乏真正的領導者……」

從農講所畢業的這批學員，大多被委任為農民運動特派員，但這種委任只維持了一個多月，因為此時，離大革命徹底失敗也只有一個月了。

沒有參加農講所開學典禮和畢業典禮的毛澤東並沒有被學員遺忘，相反地，在他日後的革命

生涯中，這批學員中不斷有人為他作出貢獻。例如：有個叫陳慕平的江西學員回到江西永新後，去了盤踞在井岡山的農民自衛軍中做事。四個多月後，當毛澤東殫精竭慮地率秋收暴動殘部進入井岡山地區時，正是陳慕平促成了自衛軍頭領袁文才與毛澤東見面。

六月二十四日毛澤東接到一項新任命，出任新改組的湖南省委書記，這是中共政治局常委會第三十一次會議的決定。這正是毛澤東熱切盼望的任命，他為此一直在做準備。

楊開慧尚在哺乳期，知道丈夫即刻就要秘密潛回長沙，很擔心地說：「潤之，這次回去不比以前任何一次回去。從民國九年（一九二〇年）到民國十四年，與趙恆惕多次爭鬥，可那時你不過是挑個頭，可現在不同了。」

楊開慧的話引起毛澤東的回憶。這些年來，他與軍閥政治人物直接鬥爭的也就是湖南督軍趙恆惕了。從衝擊省府要求「湘人自治」，到領導長沙泥木工人罷工，再到「民選省長」時支持譚延闓，最後一次是一九二五年從上海回湖南開始搞農民運動，險些被趙恆惕抓住。

毛澤東對抱著岸龍的楊開慧笑著說：「我的成長，對革命的認識，正是在與趙督軍的較量中獲得的。從最初的熱情，到現在的理性，要感謝他趙督軍的『關照』啊！」

楊開慧說：「湖南的情況有了很大變化，許克祥還有很大實力，你千萬要注意安全。」

毛澤東笑道：「霞姑放心。這麼多年了，風裡來、雨裡去，我還是和尚打傘——無髮（法）無天。雖然湖南形勢嚴峻，但我們尚有群眾基礎，再加上周瀾不是去湖南了嗎？長沙、岳陽的一

切部隊都歸這位三十六軍副軍長指揮呢。如果有可能，我還想登門拜訪這位省政府代主席——我們的父母官呢。」

楊開慧總是被毛澤東的樂觀所打動，眼前的丈夫已不是在北京與朋友擠在小民房「大被同眠」的毛頭小伙兒了，他的思想在從無政府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程中發生了巨大變化。他現在急缺的是機會，這次中央派他去湖南就是機會呀！

楊開慧親自給他準備好行李：兩件換洗的內衣，毛筆和那只跟隨毛澤東多年的銅墨盒，外加一疊毛邊紙，用一塊包袱布一包。

楊開慧說：「這次派你回去，還真要謝謝蔡潤寰呀。」

毛澤東點頭：「潤寰已經是兩屆中央核心人物了。這次中央派我回去組織新的省委，是他推薦的呀。」說到這，毛澤東哈哈大笑：「真可悶，朝裡有人好作官哦。遺憾的是他又病了，哮喘和胃病一起復發，說是要來都府堤養病。」

楊開慧高興地說：「好啊，我們來照顧他，李一純也一起來嗎？她可是我的前嫂子啊。」聽到開慧幽默的表述，毛澤東樂了。

蔡和森現在的妻子李一純原是楊開慧的哥哥楊開智的妻子，楊開智拜託從北京回湖南的李立三照顧與他一起回湘的妻子。誰知兩人在漫長的南下路上發生戀情，李一純直接隨李立三去了安源。而李立三去安源搞工運是毛澤東的指令。

蔡和森與李一純的愛情更奇特。他和向警予的「向蔡自由戀愛同盟」曾讓一大批青年羨慕，

可後來向警予在上海與中央宣傳部長彭述之好了，為了挽救蔡和森的婚姻，陳獨秀決定讓向蔡二人同赴莫斯科，向警予去中山大學學習，蔡和森去參加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六次擴大會。可是，就在赴莫斯科更加漫長的途中，蔡和森與李一純相愛了，當時李一純正隨李立三也赴蘇俄。結果，「向蔡同盟」在莫斯科平靜地解體。今年三月，蔡和森攜李一純回國。

毛澤東說：「你不用尷尬。這些兒女私情不過是革命過程中的小插曲，不妨礙大局。」

楊開慧看看毛澤東深情地說：「我卻不會這樣，愛一個，就愛到死。」

毛澤東一把摟過妻子，輕輕地答道：「我相信，我相信呀。」

毛澤東在離開武漢前，與到都府堤四十一號養病的蔡和森談了幾次。蔡和森很遺憾不能回湘革命，但他也堅持認為在湖南搞暴動完全有可能。

毛澤東對他的推薦表示感謝：「我這次回去，主要工作是恢復黨的組織關係，並想辦法打通長沙附近各縣及衡陽、岳陽、常德等地與省委的聯繫。」

蔡和森告訴毛澤東：「中央政治局對湖南的農民運動至今還有爭議，你這次回去是單槍匹馬，要冒很大風險，而且武漢這邊很可能不會給你太大幫助，要有思想準備呀！」

毛澤東點點頭：「我已經有強烈的感覺，武漢恐怕已不是赤都，更不是共產黨人的桃花源囉。你注意到蔣中正的《告全國同胞書》嗎？他說中華民族只有三條路走，其中一條是跟共產黨走，但會受國外特殊團體的指揮。」

蔡和森點頭道：「他就是指老毛子啊，這個問題很讓人困擾。獨秀有多次表示不想與老毛子合作，但不合作，共產黨會怎麼樣呢？史達林在聯共（布）會議上說：『誰絕對地、無條件地和忠實地捍衛蘇俄，保衛蘇俄，誰就是革命者……誰就是國際主義者……否則就必然要滾到革命的敵人陣營裡去。』這是把話說絕了啊。」

毛澤東抽著菸，思索著說：「捍衛蘇俄，保衛蘇俄都沒錯，但中國革命有自己的特殊性。比如，從工人中發動革命，事實證明行不通，中國的實際情況是工人少、農民多啊。前幾天鄧演達在農講所的畢業典禮上說：『現在農村確有不少錯誤，這個就是缺乏真正的領導者。這是一個矛盾。』鄧演達雖然比我們共產黨還激進，但這話是對的，很深刻。」

蔡和森說：「我也贊成。中共的兄弟們此刻正被陰鬱的悲觀情緒所籠罩，政治局的人已漫無目的，在徬徨。這種消沉的意志，導致在任何事情上都不能取得一致意見，很危險啊。」

毛澤東接話：「所以更應該盡快組織農民暴動，以扭轉這種向右轉的局勢。我已經通知易禮容他們，雖然我們沒有一個兵，但也要有軍委書記，要有搞暴動的信心和意志。」

蔡和森有點猶豫地說：「從調查情況看，目前湖南農民的耕作發生了極端困難。因為革命的緣故，農民的農具、煤油、紙菸，乃至草紙都出現供應困難，在這種狀況下，搞暴動行嗎？」

毛澤東把手中的菸頭往地上一扔，果斷地說：「正因為如此，我們才必須盡快地告訴農民，只有繼續革命，土地問題才能夠解決，被破壞了的經濟才能夠得到恢復。」

蔡和森笑道：「潤之啊，你還是有獨立寒秋的氣魄呀。當年我們都出國留學，你為我們籌

經費，記得在行嚴老處募集了一大筆錢。」

毛澤東也回憶道：「是啊，那個時候章行嚴（章士釗）先生對我們幫助不小，不能忘記啊。但往昔崢嶸歲月稠。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書生意氣，揮斥方遒。」

蔡和森說：「你的這首〈沁園春·長沙〉是一種心靈的回聲啊，可現在的中國，究竟是誰在主流沉浮呢？」

聽了這話，毛澤東陷入沉思……

（章士釗先生曾給毛澤東、蔡和森等募集留學資金兩萬銀元。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後，毛澤東以還錢的名義，從自己的稿費中每年支付兩千元給章，連續給了十年，並提拔他的養女章含之為新中國高級女外交官。）

毛澤東是喬裝成鐵路工人搭乘一列貨運火車回到湖南的，此時的湖南，通緝毛澤東等的通緝令被張貼到各處。他在岳陽悄悄下車，住進了天岳山街萬國紅十字會岳陽分會會長李若谷家，並讓李若谷去找他在湖南一師的同學施中谷。施在岳陽縣法院當檢察官，了解最新情況，毛澤東急需一手資料。

在得到了岳陽及周邊地區的情況後，他決定第二天就走。施中谷與李若谷都不敢送，而毛澤東也不敢在岳陽乘車，便由施中谷十三歲的兒子施鎧送毛澤東去岳陽西郊的南津港。

這天清晨，一位中年人與一位少年出現在岳陽呂仙亭附近的偏僻小巷中，兩人避人耳目快



速地沿著鐵道穿巷過街。少年便是施鎧，他是認識身邊的這位伯伯的。幾個月前，在武漢政府司法部工作的父親曾帶小施鎧去武昌農講所看望這位被自己稱為「詠伯」的中年人。

施鎧小聲對中年人說：「詠伯，味必居的包子真好吃。」

正警惕視察四周情況的毛澤東笑道：「你這孩子好記性，還記得我請你父子吃包子的事？有機會再帶你去吃包子。」毛澤東指指右邊，小聲地問：「你去過岳陽樓嗎？」

施鎧搖搖頭。

毛澤東說：「在我們的右手邊是洞庭湖，與我們相反方向有一處古建築，叫岳陽樓。北宋有個文學名家叫范仲淹，為岳陽樓寫了篇文章，叫〈岳陽樓記〉，從此岳陽樓就出名囉。」

施鎧忙說：「詠伯，我知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是其中名句。」

毛澤東又笑了，摸摸施鎧的頭說：「你這小崽子蠻聰明。」兩人從呂仙亭一直走到南津港，毛澤東對施鎧說：「孩子呀，你就送我到這裡。下面的路我自己走，你回去吧！」

離開岳陽後，毛澤東潛入長沙，人不知鬼不覺地住進岳父留下的「板倉楊宅」，並很快聯絡上柳直荀等人。

柳直荀是省農民協會秘書長，對「馬日事變」後湖南的農運情況非常了解。

毛澤東了解情況後，又與柳直荀、易禮容等人潛入衡陽，這是他今年第二次來此地。在毛

澤東的心中，湘南地區應該成為暴動的中心，這裡的農運和群眾基礎都適合搞暴動。

在衡陽，毛澤東對農會負責人說：「不要再徘徊觀望，立即將各縣的工農武裝集中起來，用武力對付軍隊，以槍桿子對付槍桿子。」

經過仔細調查分析後，在毛澤東的頭腦中對「馬日事變」有了深層次的認識，很明顯的一點是：此事跟唐生智與何健的爭權有關。

湘軍中，何健是實力派，控制著武漢三鎮。唐生智本欲拉共產黨反何健，但共產黨無實力，遂拉攏何健的部下許克祥鬧事，其目的就是要控制長沙乃至整個湖南。然而，在武昌的中共領導人還在盼望著唐生智處罰許克祥，真是幼稚啊。事實是唐生智二十五日已從武漢回到長沙，僅對許克祥處記過一次，而同時停止了國民黨湖南黨部等各種民眾團體的活動。唐生智的政治傾向已明明白白，共產黨要想在湖南穩住陣腳，必須先發制人。

雖然在調查研究中，毛澤東對半年前那麼轟轟烈烈的湖南農民運動現在變得如此凋零感到痛心，也很失望，甚至懷疑在湖南還能否組織得起暴動？但他深知，暴動是唯一的出路。根據湖南實際情況，他開始制定《中共湖南省委目前的工作計畫》；在這個計畫中，明確提出：「一切經濟的和政治的鬥爭，一切口號的鼓動，都以推翻唐生智的統治為目的。」他要求湖南各地的現存農會做詳細軍事報告，再由省裡做出全省的軍事報告。

毛澤東在湖南的一系列舉措，儘管是根據實際情況做出，但均是與中共中央的方針政策背道而馳的。他還不知道，湖南搞暴動的計畫已被共產國際代表取消了。武漢的中共正在積極爭取

唐生智，認為只有他可以制約愈來愈瘋狂的何健，同時也想靠唐生智的軍事實力彌補中共與武漢政府之間愈來愈大的間隙。

毛澤東的激進動作讓陳獨秀等一票書生害怕，也讓俄國顧問們不安，他們不能讓毛澤東在湖南的作為毀了原本就搖搖欲墜的國共合作大局。於是，毛澤東接到命令，要他與柳直荀立刻離開湖南返回武漢。

剛到湖南十天的毛澤東只得再次化裝，返回武昌。剛到武昌，就發現一些先前並不很清楚的事此時呈現出來，強烈的預感湧上他心頭：國共破裂已經箭在弦上。

實權派鮑羅廷被武漢國民黨中央解除職務。這位在中國待了四年、號稱是國共合作的保母的猶太人，正在他漢口西門子大廈寓所裡打點行裝，準備回國了；而與鮑羅廷對著幹的羅易，因洩密事件早已灰溜溜地走了。

一向對共產黨有好感的鄧演達失去蹤影，不知什麼原因，他同時與蔣、汪決裂。

馮玉祥的勢力愈來愈大，大到可以左右寧漢局勢；在北京的張作霖開始以「中山老友」的身分通電全國，中心思想是軍閥合作，共同反對共產黨。

在毛澤東離開武漢的十天中，中共內部也發生了驚人的變化。六月二十八日晨，陳獨秀、鮑羅廷在漢口的鮑羅廷寓所，召開中共中央緊急會議，中心議題是何健可能在當晚發動類似「馬日事變」的事件。會議決定的應變方法是：解散總工會糾察隊，交出槍枝。結果布告一出，湖北省總工會就被武漢衛戍司令李品仙派兵占領，工人領袖向忠發瞬間逃得無影無蹤。

二十九日，國民革命軍第三十五軍軍長何健發布反共通電，理由是「兩湖地方、民眾團體，時常發現越軌行動」。他將軍部移駐漢口，而中共中央被迫秘密從漢口遷至武昌。

三十日，中共中央在武昌的新機關召開擴大會議，通過了《國共兩黨關係決議案》。這個決議案共有十一條，居然全面放棄對革命的領導權，完全解除革命武裝，承認汪精衛等控制的國民黨「當然處於國民革命之領導地位」。昔日，擔任武漢國民政府委員兼農業部長的譚平山和擔任武漢國民政府勞工部長的蘇兆徵一同辭職，兩人都是共產黨員。

毛澤東見到蔡和森後大喊：「荒謬，太荒謬，老毛子究竟要幹什麼？」

蔡和森搖著頭說：「誰將承擔這失敗的責任呢？」

蔡和森告訴毛澤東，鄧演達走時特別告誡共產黨要注意，何健一定會拿共產黨開刀無疑。而工人糾察隊實際上人心已散，還沒宣布解散就紛紛逃跑了。

毛澤東認真地問：「共產黨做的讓步，能避免國共之間更大的衝突與誤會嗎？如果不能，就你所說，誰來負責？」

蔡和森發出猛烈的咳嗽，他無法回答毛澤東的問題。

這時候毛澤東當然不知道，遠在莫斯科的史達林已經為國共合作的失敗找好了代罪羔羊：那就是讓鮑羅廷在中國行使最後一次權力，主持成立臨時中央政治局，拋棄陳獨秀，並讓陳教授為失敗負全責。

若干年後，陳獨秀本人在總結大革命失敗該由誰負責時，說道：「認識不徹底、主張不堅決、動搖不定的我，當時深深地沉溺在機會主義的大氣中，忠實地執行了國際機會主義的政策，不自覺地做了史達林小組織的工具，未能自拔，未能挽救革命。這是我及我們應該負責任的……萬方有罪，罪在一人。」

而毛澤東在十年後寫《矛盾論》時，這樣歸結大革命失敗的原因：「一九二七年中國大資產階級戰敗了無產階級，是通過中國無產階級內部（中國共產黨內部）的機會主義而起作用的。」並指出他去開闢井岡山根據地是：「當我們清算了這種機會主義的時候，中國革命就重新發展了。」

毛澤東與柳直荀列席了七月四日舉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第三十四次會議。在討論湖南問題時，毛澤東把在湘十多天的經歷和思考進行彙報。會議反覆談到唐生智與何健之間的關係，每個中共領導人都想抓住最後的生機。毛澤東表達了自己的看法，如果能促成唐何分裂，就有可能拉唐反蔣。但在座的人心裡都清楚，此時的共產黨已經失去了行使政治影響力的能力。

會議依舊是不斷爭論，紙上談兵，爭論最多的是如何安排好各地農協組織及農民自衛隊問題。

蔡和森建議舉行暴動，然後上山；

李維漢反對，認為如果上山，這些農民自衛隊就可能成為盜匪，李維漢建議將農民自衛隊

變成一支官方認可的地方和平保衛部隊，或者讓他們藏起武器，慢慢等待；

陳獨秀不顧自身危機堅持主張，自衛隊應趁國民革命軍招兵時應徵入伍。他認為，只有接受國民革命軍的訓練後，農民自衛隊才可能成為一支有效的武裝力量；

毛澤東並非主體發言人，但他聽了這些無法做任何決定的討論後，還是忍不住發言。他認為，要想官方認可農民自衛隊，實難辦到，對蔡、陳提出的建議他認為都可行，但上山比較好，「上山可造成軍事勢力的基礎」。他強調，保存武力是為了應變。

會議依舊沒有做任何決定。蔡和森會後病情更嚴重了，入院養病。

八天後（七月十二日）的深夜，根據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緊急指示，鮑羅廷受命改組中共中央，組成臨時中央委員會，代行中央政治局的職權。張國燾、李維漢、周恩來、李立三、張太雷五人為臨時中央委員會委員，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陳獨秀被停職（他於七月三十日正式辭去了已擔任六年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職務）。孤傲的陳獨秀直到死，也未再回到這個自己孕育的黨內。但他從未公開反共，甚至當一九三八年張國燾背叛共產黨、邀他再組織一個黨時，他以「不可能搞得比毛澤東更好」為由拒絕了。

到此，中國共產黨的兩位創始人，都在一九二七年永遠地離開了他們親手創建的黨組織。李大釗、陳獨秀六年前相約建黨時根本想不到，他們的命運與蘇俄控制的共產國際聯繫得如此緊密。李大釗是在蘇俄大使館被抓，繼而被殺；陳獨秀則為共產國際承擔了大革命失敗的責任，成

了史達林的代罪羔羊。他的兩個兒子陳延年、陳喬年，都因為是共產黨員而先後被蔣介石斬殺。他的長女陳玉瑩先在一九二七年七月料理了大哥陳延年的後事，又於一九二八年六月為弟弟陳喬年收屍。年僅二十八歲的她，悲恨交加的她竟也歿於滬上。

過了七十四年（二〇〇一年），在北京五四大街北大紅樓邊上建了一座「新文化運動紀念碑」，在最下面的位置有陳獨秀的蝕刻像，在他上面是蔡元培、魯迅、毛澤東、李大釗。陳獨秀——這個從不被緬懷的秀才政治家，終於被他所創建的黨記起。他主編的《新青年》雜誌出現在紀念碑的上方。

中共臨時中央成立後，立刻討論挽救時局的辦法，最明確的指導思想是重視武裝鬥爭，抓槍桿子，針鋒相對地反擊蔣、汪兩個政府。決定：在張發奎的第二方面軍中發動軍事暴動；在工農運動基礎較好的湘、鄂、贛、粵四省發動秋收暴動；盡快召集一次中央緊急會議，確定黨的新方針。

此時的瞿秋白雖名義上還未進入權力核心，但鮑羅廷十分看好他，要他和李維漢等人準備中央緊急會議。在鮑羅廷心中，瞿秋白已經是陳獨秀的接班人。七月十三日，臨時中央發表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對時局宣言〉。這篇五千五百多字的宣言，完全推翻了之前中國共產黨對汪精衛及武漢國民政府的退讓政策。

宣言在闡述了北伐取得勝利的主要原因，以及有人奪取勝利果實後指出：

「現在早已到了國民黨中央應當選擇正道的最後時機：究竟是同著革命前進，還是同著反動後退！直到最後，國民黨中央及國民政府，仍舊是不肯決然地同著革命前進，仍舊繼續限制群眾運動的政策，任令一切反革命隊伍行動不受任何懲罰。

本黨的視察，認為國民黨中央及國民政府多數領袖的這種政策，實足以使國民革命陷於漸滅。

中團共產黨反對這種政策，因為對於它，民眾的利益是至高無上的。

因此一切，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決定撤回參加國民政府的共產黨員。」

宣言還聲明：「中國共產黨不能放任背叛革命的軍人，以及猶豫騎牆的政治家，冒充國民黨假藉孫中山先生的旗號以自文飾。中國共產黨決意與一切革命分子合作，只要他們能夠誠實地堅決根據三民主義、三大政策而奮鬥……」

〈宣言〉的發表，在武漢三鎮掀起軒然大波。十四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也發表宣言：武漢政府之革命使命已經終了，並已為反革命勢力所控制。

對共產黨已保持高度警惕並做好準備的汪精衛，立刻召開武漢政治委員會主席團會議，議決處理共產黨的辦法。

這時在國民黨內尚有同情共產黨的人士，如孫中山遺孀宋慶齡等。這是一座橫在汪精衛等人面前的大山，汪兆銘尚不敢像史達林對待列寧的遺孀那樣果斷處理，因此，當天的會議只是決



定派遣重要同志赴蘇俄討論切實聯絡辦法。

但不甘心的汪精衛已決心分共。在第二天召開的國民黨常務委員會第二十次擴大會議上，他終於把羅易給他的莫斯科密電通報給與會者。在解釋了電報的五層意思後，他焦急地說：「現在不是容共的問題，乃是將國民黨變成共產黨的問題。國民黨的同志想起來能不痛心？目前本黨已經到了嚴重的關口，必須在這個會議上作出生死抉擇。」

孫科、唐生智等人聽了汪精衛一番話，又考量自己的利益，紛紛發言，堅決支持分共。

孫科憤然稱：「我們容納共產黨，真是太過信任他們了。現在國民黨要下一個決心走第三條路。」

會上，宋慶齡的代表陳友仁堅持容共政策，指出三大政策是孫中山親自制定，誰反對，就是總理的叛徒。但陳友仁的發言遭到一致反對和責怪，他憤然退出會場。

七月十六日，武漢國民黨在經過反覆磋商後，發布了限制共產分子的訓令，這份訓令比較溫和，似乎是和平分共。但正是這個訓令的發布，在時間上確定了國共第一次合作的結束，同時宣告：中華大地轟轟烈烈打倒軍閥的大革命，失敗了！

也有文獻說，在武漢國民政府正式分共前三天，宋子文帶著蔣介石的信秘密回到漢口，在汪精衛家中密談。這也可能是導致汪精衛最後決定與共產黨翻臉的重要導火線。

所有對這段歷史感興趣的人都會發出疑問：大革命期間，到底是國共合作，還是國俄合作？

汪精衛的分共訓令一發出，中共中央便啟動了預案：緊急疏散。一時間，在武漢的共產黨員全部潛伏起來，所有活動都轉入了地下。

大概是因為汪精衛等的原因，鮑羅廷在離開中國前又一次登上廬山，瞿秋白陪同他去的。接著張國燾、譚平山等一票人都到廬山去了，剛被罷黜的陳獨秀則在漢口躲了起來。

到這時毛澤東才下了決心迅速送妻子楊開慧等人離開武昌回湖南。雖然分共訓令中說要保護共產黨人之身體自由，但身處政治漩渦的毛澤東認為這種所謂的保護一定不會持續下去，共產黨人不會坐視失敗。他隱約察覺，周恩來等人正在醞釀從軍隊下手，一旦成事，汪精衛便絕不會再講什麼和平分共了。

楊開慧不願意離開丈夫，她求毛澤東讓她留下。毛澤東只得耐心勸她，說道：「你注意到漢口《民國日報》上刊登的莫斯科密電嗎？汪精衛為什麼要公布這個密電？連我都沒詳細看過這個密電呀。」

楊開慧說：「那又怎麼樣？汪精衛不是說不涉及共產黨個人嗎？」

毛澤東耐心地說：「汪兆銘的話信不得呀。如果一旦情況有變，我們在這裡就是等著人家來殺頭。我告訴你一件事，今天我在六渡橋遇到了盤查，問我是否認得毛潤之……」

楊開慧一驚，忙問：「後來呢？」

毛澤東笑笑：「這樣的經歷又不是第一次。我反問：毛潤之是誰？不認識。」

楊開慧知道自己沒有留下的可能性，便想要丈夫隨她一起返鄉：「武漢的共產黨都轉入地

下了，你留在這裡沒有什麼意義，我們一起回長沙！」

毛澤東認真地說：「中央已經決定要在湘搞秋收暴動，這與我之前的設想完全吻合，湖南省委也在積極制定軍事報告。我留在這裡，一方面爭取早日回湖南工作，另一方面我還想起草一份關於湘南暴動的大綱。先讓潤蓮送你和文楠回去，這樣我也能放心啊。」

楊開慧依偎在毛澤東的懷裡，不情願地點點頭。

七月的武漢籠罩在沉悶的酷暑之中，江風帶著熱氣吹來，讓人昏昏沉沉。

毛澤東與毛澤覃把楊開慧及三個孩子，還有懷孕八個多月的周文楠等人送上了南下的火車。上車前，周文楠伏在毛澤覃肩上哭了。兩個人都沒料到，此刻的分別竟是訣別，從此天各一方，兩人再也沒見過面。而毛澤覃直到犧牲，也沒見過自己的兒子毛楚雄。他不知道這個兒子艱難地長大後，竟然也被國民黨活埋犧牲了。

毛澤東叮囑大弟毛澤民：「你護送她們到長沙後，先去松桂園文楠家，然後再送你嫂嫂去板倉娘家。這些事完成後，再去韶山，想辦法從田產中抽出一些銀元做好準備，如果不出預料，我回湖南要用錢。」

毛澤民點點頭說：「放心。你在武漢要注意安全，我看都府堤是不能住了。」

毛澤東說：「你們一走我就搬家。」

毛澤民對毛澤覃說：「你要隨部隊走了，放心吧，我會照顧好你的堂客，打仗時要小心呀。」

毛澤覃點點頭，緊緊握了握二哥的手。

看著遠去的火車。毛澤東對正難過的毛澤覃說：「汽笛一聲腸已斷，從此天涯孤旅。潤菊呀，革命者就是如此，兒女情長，沒什麼可以責備。但是，當革命與兒女情長遭遇之時，一個合格的革命者就應該以革命唯馬首是瞻。我同意你去軍隊幹，也是為革命考慮啊。你要多學軍事知識，將來我們在一起搞武裝革命時，便可以用上呀！」

毛氏一族沒有軍人出身，雖說毛澤東當過幾個月的北洋兵，那遠遠不夠。打虎需要親兄弟，如果潤菊成為領兵打仗的軍人，潤蓮打好他的算盤，自己便可以放心地運籌帷幄了。

在毛澤東看來，兄弟之間的這次分別看似偶然，實則必然。他反覆向自己一手帶大的毛澤覃叮囑，要他努力成為一名指揮員，以及注意安全、保存實力的道理。

送走妻兒，沒了後顧之憂的毛澤東隱蔽起來，但他那雙警惕的眼睛絲毫沒有放鬆對局勢的關注。他得到消息，說湖北省委要在七月二十日舉行總罷工來抵抗汪精衛的訓令。然而到了二十日，武漢街頭不見絲毫動靜，不但總罷工沒出現，連部分罷工也沒蹤影。

毛澤東再次強烈認識到，共產黨在武漢工人群眾中很缺乏基礎。他冷靜地分析在武漢的各派：汪精衛的勢力建立在唐生智和張發奎的軍隊上，現在武漢的國民黨領袖都在依賴張發奎贊助，而唐生智又是湘鄂的實際控制者。雖然張發奎對共產黨表示出了友誼，可他在武漢肯定不是唐生智、何健的對手。因此，當汪精衛說要東征蔣介石時，張發奎立刻趁機率部離開武漢。毛澤

覃就是隨這支部隊離開去了江西。

因為南京的封鎖，武漢已形成嚴重的通貨膨脹，中行、交行發了紙幣後又發國庫券，工商業陷於停頓狀態。在武漢三鎮彌漫著傳言：上海、南京對武漢的封鎖，就是為了對付共產黨。

毛澤東抓緊一切時間，落實臨時中央關於秋收暴動的問題。他認為如果要在湖南搞暴動，目前最有可能的地區是湘南。根據湖南方面送來的軍事報告，毛澤東爭分奪秒地起草了《湖南運動大綱》。

在《大綱》中，他勾勒了一幅藍圖：以汝城為中心，進而占領桂東、宜章、郴州等四五個縣，形成一個政治形勢，組織一個政府模樣的革命指揮機關，實行土地革命……在毛澤東的思想中，開始自覺地產生出了「武裝割據」的萌芽。

毛澤東在起草將要付諸實踐的革命文稿之時，遠在北京清華園內，一位中國著名散文家、學者朱自清卻在超脫現實地渴望自由。如流水一般的月色下，他寫出了膾炙人口的名篇《荷塘月色》，一千三百多字的散文裡充滿了唯美的畫面，只是當他回到現實時，才寫道：「這是獨處的妙處，我且受用這無邊的荷香月色好了。這令我到底惦著江南了……」而身處江南的毛澤東要調集自己全部的智慧，為現實的鬥爭做準備。

七月二十七日，史達林的欽差大臣米·馬·鮑羅廷離開武漢回國。在離開武漢前，他做了在中國的最後一件大事：再次改組中共中央，把自己曾經的翻譯、二十八歲的瞿秋白，放在中共

的領袖位置上。鮑羅廷在關鍵時刻，仍然沒有忘記偉大導師列寧留下的一句意味深長的話：「中國已經行動起來了——我們的責任就是要讓他永遠保持沸騰。」

汪精衛等一眾武漢政府的官員假惺惺去火車站送行，現場似乎洋溢著濃濃的惜別之情。當火車開動後，武漢政府立即給在鄭州的馮玉祥發電，要求他逮捕並處決大鬍子鮑羅廷。

不知馮玉祥由於何種原因，非但沒有逮捕鮑羅廷，還給予了這位老朋友極大幫助：派自己的部隊護送，直送到北上鐵路的盡頭。

據說，鮑羅廷離開鐵道後，帶著精心準備的四輛道奇車和一輛八缸豪華賓士車以及另外五輛卡車，向甘肅、寧夏駛去。在一行三十人中，甚至包括他的兩名中國廚子。九月二十日左右，鮑羅廷到達了蒙古首府庫倫（烏蘭巴托）。從此，他再也沒踏入中國一步。

大約一個月後，鮑羅廷在老布爾什維克協會會員大會上所作的〈當前中國政治經濟形勢〉報告中，對「四一二」後沒有集中力量打擊蔣介石表示懺悔：「這是我們在中國所犯的最致命的一個錯誤。」一九四九年，史達林下令逮捕了他（也許史達林知道，就要奪取江山的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對鮑羅廷在一九二七年的所作所為不以為然），並流放到西伯利亞，最後死在勞動營中。

鮑羅廷離開武漢的時候，共產國際的新任欽差，身材魁梧、皮膚白淨的格魯吉亞人羅明納茲已經到達武漢。這時，瞿秋白正式成為臨時中央的主持人，只是那位史達林的老鄉羅明納茲根本沒有把中共臨時中央放在眼裡。

毛澤東曾與鮑羅廷數次交流，從未被口才超好的鮑說服過。但他對臨時中央做出的三項決

定表示擁護，甚至認為如果半年前做出這樣的決定，大革命不至於敗得這麼慘。

做了十幾天湖南省委書記的毛澤東此時在國民黨那裡已失去了職務，而在共產黨這邊，中央決定讓易禮容接替他的書記職務，他的政治生涯似乎都歸零了。可如果有誰因此而小覷了毛澤東，那就真的錯了。他在湖南的威信和影響力不但未受影響，很多人反而都在盼望他盡快回湘。

臨時中央的第一項決定：在張發奎的第二方面軍中發動暴動，這件事八月一日在江西南昌開始實施。這也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領導軍隊暴動，打響的第一槍。

暴動是鮑羅廷臨走時敲定的，羅明納茲並不看好，暴動也險些因為這位新欽差的搖擺態度而夭折。當時沒有誰想得到，過了六年，中共決定將八月一日定為中國工農紅軍的建軍日；過了二十八年，共和國的十大元帥十大將中，有十一人參加了南昌暴動。「暴動」二字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改為「起義」。

八月初的幾天，毛澤東密切注意來自南昌的新聞，同時也為弟弟毛澤覃的安危擔憂。他在醞釀湘南暴動時，把南昌暴動的部隊納入其中。他想，無論如何，槍桿子也要掌握在訓練有素的正規軍手上才能事半功倍。這也是讓弟弟加入軍隊的良苦用心。

若干年後，有南昌的媒體信誓旦旦地說，一九二七年七月三十一日毛澤東在南昌贛江北的牛行車站出現過，他站在贛江邊，聽到了南昌城內的槍聲；不知何故，他沒有進南昌，而是折回了武昌。

過沒幾天，在南昌成立了政權組織的暴動部隊撤出南昌，開始南下，毛澤東心急如焚。在他心中，這支寶貴的部隊不應該南下，而應迅速轉向農村，建立根據地。

三十四年後，已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的周恩來在南昌參觀八一起義紀念館時，懺悔地對身邊的人說：「當時只曉得生搬硬套蘇聯的經驗，搞大城市起義，沒有人提到要搞農村起義。起義軍如果不是南下廣東，而是轉向廣大農村就好了。可是，在農村建立根據地，當時只有毛主席提出來了……」

南昌暴動前後，武漢的形勢空前嚴峻起來。七月二十九日漢口全城戒嚴，湖北總工會被勒令解散三十日，何健動手逮捕共產黨員，並開始殺人；八月三日，武漢國民黨下令各軍制裁共產黨。在漢口《民國日報》的一版赫然寫道：「對共產黨徒一經拿獲，決不寬恕。」

接著汪精衛發表了〈錯誤與糾正〉一文，稱：「我們為什麼一直要等到共產黨員快要消滅國民革命，我們才不容他，這真是我們極大的錯誤。」旋即，毛澤東等一批人被公開雙開：開除國民黨黨籍、開除公職。

這時，一個更加血腥可怕的口號在武漢三鎮傳播開來，並開始向全國蔓延。它比蔣介石殺共產黨更狠更毒，這個口號就是：對共產黨「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

中共臨時中央也爭分奪秒地加快了革命步伐，對毛澤東很有好感的瞿秋白迅速通過了《湖南運動大綱》，並在八月三日制定了《中共中央關於湘鄂粵贛四省農民秋收暴動大綱》。



大綱由四個部分六條戰略組成，推翻了之前所有對農運工作的訓令，期待在湘粵建立新的革命政權。大綱對湖南農民運動給予了充分肯定，號召農協「勇往直前地領導秋收暴動」。而暴動的主要戰略是：「宣布農會為當地政府」，「奪取一切政權於農民協會，殲滅土豪劣紳及一切反革命派，並沒收其財產」，「農民協會組織土地委員會決定土地之分配」等等。

大綱由對四省的具體工作做了部署，對湖南的要求是：「準備於不久時期內在湘南計畫——湘南政府，建設革命政權，及一切革命團體。」同時成立了「湘南特別委員會」，由夏曦、郭亮、毛澤東、卓宣四人擔任委員，毛澤東為特委書記。最特殊的是，大綱授予了毛澤東一把尚方寶劍：「於交通不靈通時，得有獨立指揮此委員會所能活動的地方工作。」

看到大綱後，毛澤東非常興奮。在心中畫了無數遍的藍圖，終於有可能在自己的手中試著變成現實。他吐出了胸中那口悶氣，自言自語道：「這份大綱如同春風，給這炎熱的武昌帶來涼爽。要謝謝瞿老師啊！」

雖然武漢的所有共產黨人一夜之間都從明處轉入暗處，但多年建立起來的秘密交通網沒有受到影響。這條看不見的交通線連接著各處，無論在何種情況下，它都保持著暢通。

八月五日，毛澤東接到通知：八月七日到漢口三教街（今鄱陽街一百二十三號）參加重要會議，並做好保密工作。

毛澤東當然想不到，這次緊急會議將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成爲一個關鍵的轉折點，而會

議的召開，直接導致共產黨人由大革命失敗到土地革命戰爭興起的歷史性轉變。

正是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被選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這預示著他向黨的核心圈邁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

